

# 亚投行支点的国际权力转移与 杠杆发展机理

刘 柏 张艾莲

**[摘要]**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安全体系愈发暴露出不稳定性和不公平性,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洲投资银行打破了现行国家之间的博弈关系,完善和补充了现存国际金融体系。亚投行以资金投资为支撑扩散成面,通过对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加快形成有效互通往来的经济带。由此构建以亚投行为支点,“一带一路”为杠杆的经济贸易圈,随着贸易往来的深入和扩展,释放经济能量。但是到目前为止,亚投行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在未来发展进程中,需要秉持建立初衷和发展信心,在资金渠道扩充、中国杠杆比例控制和规则设定等方面还要进行规范制定。

**[关键词]** 亚洲投资银行;国际格局;资金支点;杠杆;博弈

**[中图分类号]** T83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654/j.cnki.naf.2016.03.007

**[文章编号]** 1003-7411(2016)03-0071-(9)

**[收稿日期]** 2015-11-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JY156);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术领袖培育计划(2014QY058)

**[作者简介]** 刘柏,吉林大学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张艾莲,吉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长春 130012)

中国从亚洲崛起走向世界强国的进程中,已经获得了经济和贸易诸多方面的国际认可。但是,成绩的取得主要来源于国内的强势发展和单边影响力国家之间的传递。随着经济和政治的融合加深,中国对国际关系的贡献已经跨越了历史辩论期,进入国际组织的塑造平台。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正式成立改变了中国和亚洲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博弈关系。亚投行将是中国政府牵头建立的第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虽然这只是一个区域性的支点,但是依靠国际杠杆将会迸发撬动世界的力量。深入探究亚投行的形成机制和支点杠杆作用,将有利于中国主导的新型国际关系规律的构建和发展。

## 一、亚投行对国家博弈的突破

### (一) 亚投行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权力构成

2013年10月习主席出访东南亚时,提出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想法。一年之后,2014年10月24日,中国、新加坡、印度等21个国家在北京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首批签署的国家主要来自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国家。2015年3月,英国、韩国、俄罗斯、德国和法国等经济强国相继提出了申请加入。除了美国和日本,世界十大经济体的其他国家都已提出了加入申请。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全部确定,57个国家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仅仅比1966年成立的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国少了10个。同时,国际上重要的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都表示愿意与亚投行进行合作。在短短时间内,亚投行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在国际关系背景、利益形成和未来发展路径中,亚投行面临不同权力和关系的矛盾和合作,其规则的设定也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治理的未来典范。

在当今世界上,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的民族经济是完整的,由民族经济转向世界经济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前提条件。<sup>[1]</sup>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一国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互博弈中谋求优势和获得利益。这种国家之间的关联关系日益密切,从而形成了整体联动格局,一旦一个市场发生波动,与其相关的其他市场必然受到波及。因此,经济全球化使得国家在经济和以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层面更为脆弱。为了降低这种脆弱性,国家不仅在国际层面而且在区域层面需要做出规划和反应,区域性组织的建立就是地区反应的直接表现。事实上,区域性组织就是在特定区域内国家形成的经济合力和政治协作。而国家进行经济整合的影响因素是地理条件、文化关系与经济共同利益等要素。<sup>[2]</sup>这也是中国首个国际组织集中于亚洲地区的关键原因,地理位置相互比邻的亚洲国家文化传统也类似,而且亚洲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共性使其经济利益共同点更为统一。

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占据重要位置,国际关系体系的实质就是国家之间的经济资源争夺。经济学家在对区域整合的分析过程中,通常割裂经济与政治,但是事实上二者是密切相关的。<sup>[3]</sup>亚投行的建立正是顺应了这一理念。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的本质所在,利益是决定国家行为的核心因素。无论一个国家处于何种规模水平,利益追求是其对外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在国家追逐利益的过程中,权力是争取利益的前提条件,利益追逐行为无法超越一国自身的能力范畴。所以,在国际层面获得利益取得优势首要的是增强国家实力的同时,拓展能力范围。国家的目标是追求以权力为界定的国家利益,只有不断运用自身实力去影响其他国家,国家才能赋予自身的权力。<sup>[4]</sup>

权力转移理论是一种动态组织框架,认为权力是强迫或者说服对手遵循自身设定的框架或要求。<sup>[5]</sup>根据权力转移理论,国际组织的建立需要国家具备国际权力,而权力的组成要素主要是人口、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在人口方面,人口数量对国际权力的影响在长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数量最多的国家,2014年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达到了13.678亿,占世界人口总数比重接近20%,这为中国的国际权力奠定了人口基石,这也是其他国家短期内无法实现的影响要素。在经济实力方面,经济实力的改变快于人口规模的变化,在中期

内会对国际权力产生影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仅位居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强国,外汇储备更是连续数年位居世界第一,经济的稳定发展为国际权力奠定了经济基础。在政治实力方面,政治实力可以在短时期内就对国家权力产生影响,中国近些年在国际事务中展现的领导为国际权力奠定了政治基础。上述三个方面说明中国已经具备了在国际层面上的国际影响力,亚投行的建立成为这种国际领导力的集中体现和合作平台。

## (二) 亚投行的国际组织属性

在国家利益追逐的过程中,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冲突和矛盾,但是冲突的存在不会阻碍合作的进行,只有遵循共同的行为准则,国际社会才会维持稳定。<sup>[6]</sup>国际组织就是形成这种共同行为准则的必要条件。国家在利益获得和权力抗衡与合作过程中存在的冲突、矛盾以及亟需解决的问题需要国际组织的协调,尤其是建立经济领域的国际金融机构进行调节和协调。

在国际社会上,有效且稳定的国际金融机构,必须能够解决三个问题,即清偿能力、调整 and 信心。<sup>[7]</sup>对于亚投行而言,首先,在清偿方面,清偿能力是国际组织能够进行支付的国际流动资产,亚投行的《备忘录》已经确定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而同为亚洲地区银行的亚洲开发银行建立之初的法定股本只有10亿美元,2009年资金规模才增至1650亿美元。虽然二者建立时间之间存在较长的时间间隔,但是亚投行的初始资本相对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较为雄厚。另一方面,创始国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以及发达国家的加入也为亚投行的资本积累奠定了基石,因此亚投行具有强大的潜在清偿能力。其次,在调整方面,作为亚洲唯一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国家,中国还是亚洲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在亚洲地区具有领导作用,且在诸多交往和协商中具有话语权。亚投行的建立针对亚洲薄弱环节即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并以此为支点形成面板支撑,强化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发挥了经济和政治的调节作用和各国关系的调整作用。最后,在信心方面亚投行的建立体现了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因为基础设施的建立和完善是一国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等众多国家的加入和参与也彰显了成员国对亚投行的信心。

现存的国际金融组织大多数是发达国家倡议并主导的机构,因此发达国家拥有国际组织的资源和话语权,导致现有的国际规则是由发达国家制定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有限。因为国际性组织受自身资源的限制,且业务又面向全球范围,所以对亚洲地区的侧重和资源投放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很难获得所需的援助,从而无法改善地区发展状况。如世界银行即使对亚洲地区进行援助,也大多数集中于印度、巴基斯坦等前英联邦国家,对亚洲整体状况的改善是不足的。在亚洲地区具有重要投资功能的亚洲开发银行历任行长都是日本人,使其仍然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和影响。发达国家经常凭借自身优势通过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施压,促使其满足发达国家的要求。亚洲开发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援助主要集中于农业发展,这主要是为了保障向发达国家提供农产品供应,因为发达国家致力于发展第二和第三产业,对农业的导向型援助使得发展中国家发展高新技术和金融等产业的投入有限。<sup>[8]</sup>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只有摆脱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的钳制,才能挖掘自身发展潜力,实现经济腾飞。若要在一定范畴下摒弃发达国家的限制和制约,创立符合自身发展路径且源自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开发机构就成为必然选择。亚投行正是发展

中国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破解博弈过程中产生的。

亚投行的建立虽然会与现存的国际金融机构产生一定范围的交叉和重叠,但是在相互竞争的同时,能够以点带面整合区域内资源并实现合理配置,加速地区国家间的合作交流,从而树立发展中国家的地区主导地位和影响力,并填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薄弱环节,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亚洲开发银行每年在基础设施方面为亚洲国家提供的资金贷款量为100亿美元,而资金需求量则高达8000亿美元。根据亚洲开发银行预计,从2010年到2020年,亚洲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要想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内部基础设施投资需要8万亿美元,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另需3000亿美元,融资缺口巨大。<sup>[9]</sup>2011年以来,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各国都先后发布了基础设施投资计划。2011年印尼公布2015年国民建设规划,仅2011年至2014年的中期计划投资总额即达4700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投资占比约40%;2011年越南政府提出2011年至2020年投入4000亿美元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其中2011年至2015年投入1600亿美元;泰国2013年批准了726亿美元、为期7年的投资规划。一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基础设施的要求就越高。基础设施的交通便利且能源的供应充足,能够为生产和服务活动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推动,同时吸引外部投资资金和技术,从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在现行国际组织交叠区间遗留亚洲发展中国家基建投资发展空间的条件,亚投行以此为突破口,凭借雄厚的资本基础和众多的成员国,改变了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组织博弈格局,并冲击和变革着国际关系。虽然亚投行帮助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回报较低,但是通过国际组织形式替代国家间的博弈成为当今社会国际关系的必然选择。

## 二、亚投行支点的承载与负荷

### (一)亚投行承载中国外汇储备的两难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出口规模的不断攀升不仅有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而且提升了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1980年中国出口总额为271.2亿元,进口总额是298.8亿元。到了2015年,出口总额为141 356.91亿元,增长率达52 022.75%;进口额为104 492.08亿元,增长率达34 870.5%。<sup>①</sup>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3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这也是一百多年以来发展中国家首次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的大国。与之相伴随的是外汇储备的积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汇储备基本上处于“零储备”状态。1978年至1989年期间,除了1982年、1983年、1984年和1989年外汇储备超过了50亿美元,其余各年的外汇储备余额均未超过35亿美元。但是,到了2006年,外汇储备规模迅速攀升至世界第一位,并且连续数年排名世界第一。2015年年底外汇储备更是高达33 303.62亿美元。<sup>②</sup>高额外汇储备导致中央银行被迫发行货币以购买外汇,形成外汇占款形式的货币供给,推动货币供给量增加,因此外汇储备的投资去向关系到资源的优化配置。

① 商务部网站数据。

② 外汇管理局网站数据。

2015年,美国财政部公布了9月份国债国际资本流动数据,中国大陆持有规模为1.258万亿美元,仍然是美国国债第一大持有人。在此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9月底中国外汇储备总计为3.514万亿美元,这说明美国债券投资占到了中国外汇储备的35.8%。这种较为集中的外汇储备投资高比例使得外汇投资收益在一定范畴内受制于美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外汇储备成果通过投资美国债券而成为美国推动自身发展的资金支持,这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会产生限制。投资的收益性是进行投资的重要考虑要素,美国国债虽然具有一定的安全性,但是收益率水平并不高,2015年9月美国国债短期收益率并未超过1%,如10年期的长期国债收益率仅仅位于2%左右。在涵盖通货膨胀率等因素基础上,这一低水平收益率对于持有大规模美国国债且外汇储备较高的中国而言不利于资本升值,同时也将使得经济收入折损。因此,亚投行的建立给予了中国有效的资本输出渠道,虽然对亚洲基础设施的投资利息较低甚至是无息,但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衍生作用和延展收益是巨大的。基础设施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一定投资额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产生并带动数倍于投资额的社会需求和经济效益,并促进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优化演进,从而成为经济发展质量和竞争力的基础要件。

## (二) 亚洲权力载体的负荷转变

亚洲地区融合的困难较之其他区域更大,因为亚洲地区国家数量较多,而且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等类型,文化背景等各不相同,所以在亚洲整合的过程中,区域组织的构建更需要强大的领导者。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雁行理论,这一理论体现了日本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成长模式,认为因为各国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且处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这种阶段化呈现出大雁飞行的V型。同时指出,日本处于雁头的位置,因为其拥有先进的技术水平和发达的金融体系,亚洲“四小龙”位于雁翼,而其他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处于雁身至雁尾位置。发展中国家从日本获得所需的技术和资金,而日本跨国界进行资源重新配置。其后在较长时期内,在东亚形成了日本到“四小龙”到中国 and “东协”国家的多层次分工结构。

但是,自80年代“广场协议”之后,日本从90年代开始持续出现经济低迷,国内生产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逐渐攀升,造成商品价格上升,降低了国际竞争力。同时,日本产业结构严重滞后,经济泡沫破裂导致经济下滑,对其他国家不再具有拉动的作用。2001年5月日本政府发表的贸易白皮书中,首次承认了日本充当亚洲经济发展“领头雁”的“雁阵”型发展的各国和各地区的产业分工体系已经逐渐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极速成长的中国经济。<sup>[10]</sup>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推动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是日本经济总量的两倍左右。中国经济对日本造成巨大压力的同时,与周边国家的紧密关联如中韩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形成了比邻日本的大型“经济体”,雁头不再是日本的专属,而中国成为东亚重要的领导者。日本经济的失落以及中国经济的强大崛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使得日本在亚洲的原有强势地位发生改变,在亚洲地区甚至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弱于中国,中国正成为亚洲权力的新载体。

## 三、“一带一路”国际杠杆的能量释放

与亚投行同时期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成了亚投行的有效杠杆。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带一路”从内陆和海洋两条交通线路对欧亚大陆进行了经济整合,沿线包括了中亚、东南亚和中东欧等几十个国家,国家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随着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建立,亚投行作为区域多边开发机构形成了有效的支点,“一带一路”通过内陆和海洋两条线路构成了面板杠杆,借助于亚投行的资金支撑,呈现出杠杆效应,会在沿线释放出巨大经济能量。

不同国家的自然禀赋、人力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势和劣势各不相同,同时还存在完全相异的约束和限制,因此各国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异。如果各国之间不进行互通有无和经济往来,则差距将日益扩大。互通有无是以便利的交通为前提的,交通设施建设成为经济活动的基础,并对国家全面建设起到先导作用。大规模运输计划有助于国家和区域的发展。<sup>[11]</sup>重大交通建设因其建设时期长,投入资金巨大,影响范围广泛,对于区域人员和产业活动具有重大冲击,而且人口和产业活动也直接影响区域发展。<sup>[12]</sup>

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中,大多数国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欠缺且不完备,尤其是部分交通设施亟待建设和完善。因此,“一带一路”首要发展的就是基础设施,尤其是联通各国而形成“带”和“路”的交通线路,基础设施中的交通建设能够拓展贸易商圈,通过融合形成强大的经济联合体。“一带一路”的建立和经济带沿线各国的经济紧密往来与交通建设息息相关。这就意味着交通运输的构建,不论是海路还是陆路的建设,路线都将不断拓展和延伸,交通设施是关系到各国通过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联系的关键,如果不存在有效便利的交通设施,“一带一路”意旨构建的经济带将缺乏有效的流通枢纽而推进缓慢。2014年11月开通的“义新欧”中欧班列从中国义乌出发,途径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等8个国家,最终抵达西班牙马德里,全长达到了13 000多公里。这将亚洲的东边与欧洲的西边贯穿起来,大幅度降低了交易成本。如果铁路沿线的国家不参与到铁路的建设以及由此延伸的商品交易,将会损失新经济增长点,而且会被排除在其他国家贸易圈之外。因此,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中提出的合作重点就指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尤其是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通达水平。加入到“一带一路”的贸易圈成为各国博弈优化选择的结果。由此,各国经济等方面融合形成全方向辐射状态,产生了由点及面的效果。<sup>[13]</sup>

“一带一路”囊括的众多国家和地区之间贸易交往带动的基础设施需求对资金迸发出惊人的需求量,而发展中国家的特性使得无法支付高昂的资金成本,因此低息甚至是无息的投资资金成为这一地区腾飞的主要助推器。亚投行的设立初衷正好符合了交通设施对资金的需求要求。《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强调,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如果没有资金的投入,“一带一路”的交通无法建成,也就无法实现商品的便利运输,因此将削弱贸易往来。亚投行的投资取向将是重要的支撑点,而且因为同属于中国发起的,更易于形成叠加促进效应。交通设施的施工和建设是依靠大量资金

的投入而实现的。以中国为例,2014年新线投产达到8427公里,完成建设投资8088亿元。并且,投资总额不断上调,从年初的6300亿元左右连续调整了3次,达到了8000亿元,比年初设定的目标增长了27%,如此大规模的投资需求需要专门的机构或组织进行。亚投行提供的资金利息较低,甚至是无息,这对于无充足资金投入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资金支持,并以资金投资为介点,继而覆盖成面。通过亚投行对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交通设施的建设,“一带一路”的推进速度将加快,形成有效的互通往来的经济带,从而形成以亚投行为支撑点,“一带一路”为杠杆的经济贸易圈,并且随着贸易的深入和扩展,将迸发巨大的经济能量。

#### 四、亚投行未来发展路径的机理和畅想

##### (一)亚投行的资金渠道扩充

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缺乏大规模的资本投资,因此资金来源至关重要,否则无法支撑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亚投行主要投向的领域就是基础设施,虽然亚投行的建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并补充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但是资金需求总额还是存在巨大的缺口。《筹建亚投行备忘录》显示,亚投行的初始认缴资本目标是500亿美元左右,其中中国出资50%。亚投行的注册资本金是由成员分期缴纳的,第一期实际缴纳资本金为初始认缴目标的10%,即50亿美元,其中中国仍然占比50%,为25亿美元。其他20个创始国共同承担认缴剩余的25亿美元,这些国家基本都是经济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资金提供有限且还款能力不强,并且不具备充足的实力在国际金融市场筹措资金。亚投行成立之后,资金来源还包括每年的年费,这笔费用同样会给发展中国家造成压力。另一方面,亚投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投放基本是低息或无息的,因此利息收入较低。<sup>[14]</sup>

在这种情况下,亚投行应该扩展筹集和吸纳资金的能力。首先,扩大成员国数量是首要渠道,通过成员国的扩容,积聚新成员国缴纳的资金,不仅能够扩大亚投行的影响力,而且能够增加资金来源,尤其是吸纳发达国家作为成员,英国和德国等经济强国的加入,将带来更多的资金流入。因此,要实现亚投行的初始资本目标并扩大资本规模,需要吸纳资金雄厚的发达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其次,除了亚投行自身资金的提供,还可以以成员国国家信用为担保,发行亚投行债券,为亚投行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资金来源。在发行的债券种类中,应该以长期债券发行为优先,这样能够避免短期偿还造成资金压力。亚投行的创始国——中国的国家信用等级较高,2015年11月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确认中国长期“AA-”和短期“A-1+”的主权信用评级,且长期评级的展望维持稳定。尤其是提出申请加入的欧洲发达国家信用等级较高,这些为亚投行的债券发行提供了有效保障。强大的信用保障能够在国际债券市场上获得高水平的信用评级,从而降低融资成本。而且,亚投行成员国中很大一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资金缺乏,借助于亚投行的平台,不仅可以弥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不足,而且可以通过亚投行的担保发行债券以获得资金。

##### (二)中国在亚洲投资银行亚投行的杠杆比例控制

现在的国际组织中,亚洲开发银行中的日本和美国的股份比例是最高的,为15.65%,因此

二者具有一票否决的权利,中国所占比例位居第三,但是仅有6.46%。所以虽然亚洲开发银行被称为亚洲的银行,但是实际上成为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世界银行的主导国家一直是美国,美国是最大的出资国,所占比例为16.5%。国际组织的控制权比例说明,成为主导国家并不需要出资比例非常高,中国现在出资比例为50%,这是因为创始国中基本是亚洲规模较小的发展中国家。随着欧洲等地区的发达国家陆续加入,资金的投入规模会扩大,而且资金充足度会增强,因此中国不必再占据如此之高的持股比例,只要占有最高比例即可,这样有利于避免负担过重。因此,中国应该采用恰当的资金比例,由此发挥杠杆式作用影响亚投行的运转,实现亚投行导向性领导。

日本虽然现在未参加亚投行,但是随着亚投行参与国家数量的增加和影响力的扩大,作为亚洲强国日本被排除在亚投行之外会产生隔离感,并处于亚洲的边缘。亚投行投资项目实施后产生的产能输出和占领国际市场的效应是日本所无法预知的。随着亚投行的强大和亚洲业务的渗透,日本将不能置身事外。一旦亚洲最大的发达国家日本加入亚投行后,股份比例将会发生改变,因此,除了要限制亚洲地区外国家的投票权,还应设定发达国家的投票权比例,以凸显亚投行以发展中国家为核心的宗旨。

### (三)亚投行的规则设定

亚投行是由发展中国家中国发起建立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性和状态使得亚投行能够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进行原则设定和规则制定。亚投行的建立能够在一定范畴内尤其是亚洲地区扭转发达国家设定的国际规则。

亚投行的运作流程和规则现在还在探索建立过程中,在这一前提下,美国和日本的暂时不加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亚投行规则设定过程中矛盾的加剧。在亚投行的规章制定过程中,需要围绕以下几个核心,一是亚洲地区,二是发展中国家,三是基础设施,四是中国。这四个方 面缺一不可。严格恪守亚投行设立的初衷,资金流向集中于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不涉及其他大洲的国家和发达国家,借此聚合力量发挥资金的效率。只有以中国为核心建立运行机制,才能避免成员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加入将亚投行再次改变为发达国家规则下的国际机构。

亚洲开发银行因为资金有限,对贷款项目的审核条件较为苛刻,导致效率不高。作为国际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与其他国际组织一样面临机构组织的问题,由于涉及众多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国家,内部各部门的分工也相当细致。组织机构庞杂和分工明细能够保障大型机构的有序运作,并满足各方面的要求。但是与此同时,烦琐的部门流程也容易造成业务流程的缓慢和延迟。当成员国提出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申请时,阅查、评估和审核等工作持续时间如果较长,一方面易导致投资项目因为资金不到位而延后,从而失去了建设的有利时机;另一方面,贷款申请时间的拖延会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质疑。因此,亚投行在满足项目投资要求的条件下,要提升项目审批的效率。在发放贷款之前,亚投行都会与借款国进行商议和协商,因此为了提升工作效率,亚投行应该针对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前做出详尽的调查和评估。因为不同国家的自然禀赋、资源配置和人力资源相异,而且即使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所以要针对不同的国家出具符合各自特征的调查报告,以确定和挖掘一个



国家基础设施面临的最重要且最亟需解决的问题, 优先投入发展关键环节, 以节省贷款审批的时间, 加速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 亚投行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平台, 可以引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成熟的建设项目领导小组, 并增加雇佣当地的工作人员, 解决项目所在国的就业问题。在建立和完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同时, 雇佣当地人员能够增加亚投行的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这将推动刚刚成立的亚投行实现短时期的影响扩张和国际声誉。

2016年1月16日至18日, 亚投行的开业仪式意味着以亚投行资金支持为支点, “一带一路”为杠杆辐射亚洲并覆盖全球的国际合作体制正在形成。然而到目前为止, 亚投行只是在国际机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迈出了第一步, 在实际运作、贷款操作和关系协调等方面还面临很多问题, 在未来发展过程中, 需要秉持建立的初衷和发展的信心。

### 参考文献

- [ 1 ] 施岳群, 陈佩尧. 探索冷战后的世界[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1.
- [ 2 ] Sannwald R. F. and Stohler J. Economic Integration[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38.
- [ 3 ] Susan Strange.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154.
- [ 4 ] Organski, A. F. K. World Politics[M]. 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58: 3.
- [ 5 ] Jacek Kugler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up>st</sup> Century[M].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244.
- [ 6 ] Hans J. Morgenthau and Kenneth W. Thomson.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M].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51.
- [ 7 ] Benjamin J. Cohen. Organizing the World's Mone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128.
- [ 8 ] Wihtol, Robert.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and Practice[M]. Macmillan Press Limited, 1988: 103.
- [ 9 ] 张立伟.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亚洲共赢[N].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4-10-24.
- [ 10 ] 杨义瑞. 日本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立场浅析[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5): 71-74.
- [ 11 ] Rephann, T. J. Highway Investment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J]. Urban Studies, 1993, 30(2): 437-450.
- [ 12 ] Rephann, T. J., and A. Isserman. New Highways 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ools: an Evaluation Using Quasi-experimental Matching Method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94, 24(6): 723-751.
- [ 13 ] 黄建欢, 潘丽琴, 宋海涛. 中国投资者不注重价值投资吗?[J]. 商业研究, 2015(9).
- [ 14 ] 陈松威. 银行利润持续性研究[J]. 商业研究, 2015(7).

〔责任编辑 孙界丽〕